

费孝通全集

第二卷
(1937-1941)



费孝通全集

第二卷
(1937-1941)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费孝通全集·第2卷,1937~1941/费孝通著.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3

ISBN 978-7-204-09796-8

I. 费… II. 费… III. 费孝通(1910~2005)—全集 IV. C5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203243号

费孝通全集

费孝通 著

责任编辑 王东生 王占英 王继雄

责任校对 县翔

封面设计 宋双成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开本 880×1230 1/32

印张 292

字数 7025千字

版次 2009年10月第一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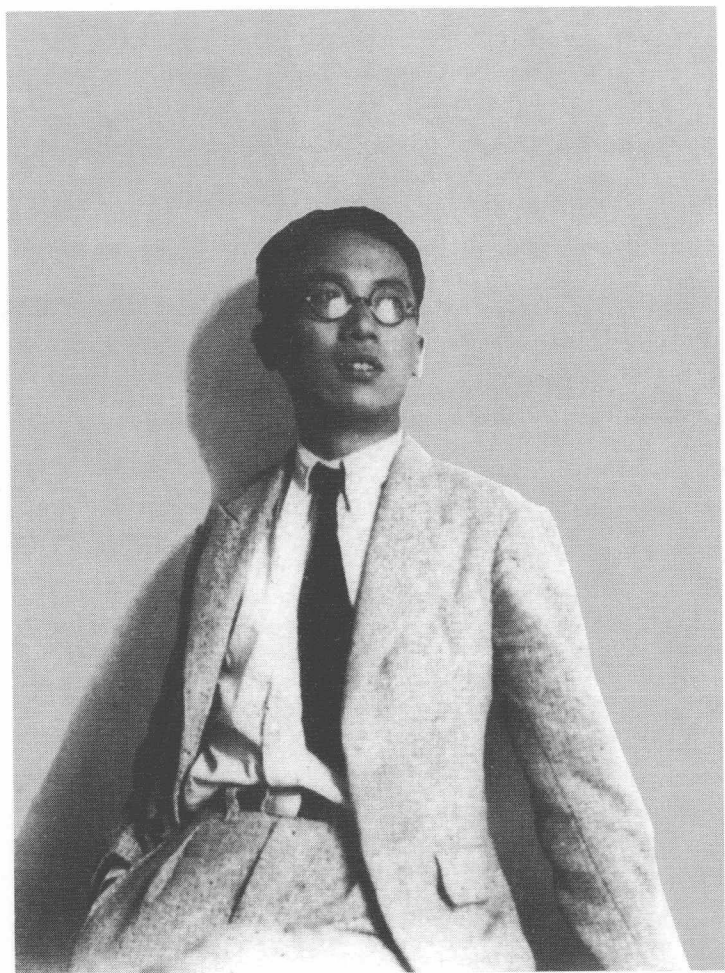
印次 2010年2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5000套

书号 ISBN 978-7-204-09796-8/C·200

定价 880.00元(全20卷)

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0471)4971562 4971659



20 世纪 30 年代的费孝通

本卷说明

本卷收录了作者 1937 年至 1941 年间所撰写的文章。这些文章均为作者在英国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在云南大学任教及主持社会学研究工作站时期的研究成果。其中《江村经济》一文是作者 1938 年根据在家乡农村的调查材料用英文写成的博士论文。作者的老师布·马林诺斯基教授在为此文所作的序中称，此文“是人类学实地调查和理论工作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鉴于该序在学术上的重要性，我们特将其附于《江村经济》之后。此外，为了便于读者查阅，我们还将作者于 1985 年 4 月为《江村经济》中译本所写的前言一并收入本卷。

本卷中的文章均以写作时间先后为序。在编校上，除了对个别明显的排印上的错失予以纠正外，其余一律存其旧貌。

目 录

伦市寄言	(1)
理论与实地社会研究	(19)
再论社会变迁	(24)
论马氏文化论	(35)
从社会变迁到人口研究	(39)
书评	(52)
复刊周年通讯	(62)
显微镜下切片素描	(65)
江村经济	(68)
《江村经济》中译本前言	(284)
农村里的囤米	(288)
患土地饥饿症者	(294)
农家费用的分析	(300)
娱乐? 工作?	(306)
西南工业的人力基础	(313)
农贷方式的检讨	(319)
劳工的社会地位	(324)
消遣经济	(330)
中国乡村工业	(337)

伦市寄言

本刊三年的回忆

离现在已有三年多的一个晚上，暑假快完，初秋将届的时节。我们几个朋友在杨开道先生的家里，吃过了夜饭，不知是谁提出了一个兴奋的问题：我们有什么方法能多得到一些认识本国社会的机会？大家整天在图书馆里，在课堂上听到的无非是不关痛痒的西洋社会事实和议论纷纭莫衷一是的社会理论，谁都有些不耐烦起来。就在这晚上我们提出了一个社会通讯研究的办法。我们这时以为在社会上富有生活经验的人若能得到研究的方法，一定能供给我们很丰富的事实报告。我们是有方法而没有经验，他们是有经验而没有方法，若二者之间能筑一顶桥，事情就得了。当时，我们就拟出了一个通讯研究的办法，借《大公报》的《社会问题》发表了。

在那时候，我记得关于社会学的副刊，除了《社会问题》之外，还有一个《社会思想》在《益世报》上发行。我们觉得在没有充分事实的根据而谈“问题”及“思想”不免太空虚。但是我们又不愿意在“问题”及“思想”的招牌下来做极干燥单调的事实记载。因之，在晨报另立了一个园地，直接称作《社会研究》。而且在发刊词里我们郑重声明，希望读者不要希望我们有什么动人的言论，我们只供给一些研究的方法和各地实况的记录。为了要和各地对于社会研究有兴趣、可以

接受我们方法上的指导，而发表实地生活情况的朋友们取得联系，所以推定了兆临专司编辑和通信的责任，同时我们更借此机会，每星期定期集会，成立了一个没有章程、没有规则的社会通讯研究社。

不久，我们就发现了通讯的办法行不通。社会研究单靠兴趣是不够的，研究的方法更不是几篇零散的文章及简短的通讯所能传达。第一需要有一个正确的观点，第二需要做有系统的观察。这时我们自己观点还没有拿稳，又没有实地观察的机会，于是在“社会研究”的名称之下，只做了些极平常的方法论及社会学观念的介绍而已。这一年中最好的成绩也许是要算庆堃到邹平实地去研究市集组织，但是他的材料并没有在本刊全部发表。他研究邹平的市集是大部分用区位学的方法来发现在地域上所表现的社会基本的经济活动。他这种实地观察的方法给其他朋友们极大的兴奋。“到实地去”的口号就在这时候普遍地深入了我们的队伍里了。

这一年的工作，虽没有表面的成绩，但是，在错误中我们已学得了乖。同时，我们得到了许多师长和朋友们的同情而加入合作。所以在第二年的开始，我们改组了社会通讯研究，直称作社会研究社，又推举了吴文藻先生做我们的领袖。阵容一新，大家希望很大，但是就是在这时候，我们的健将庆堃和安宅相继离国，实力不免稍减。

在第二年，我们已从零星片断的介绍文字进入确定我们研究对象、观点、方法等基本问题，“社区研究”这四个字开始成了我们的招牌。我们虽用“社会研究”的老名称，但是我们已从抽象的“社会”走到了具体的“社区”。现在已经给国内社会学界所接受的“社区”一词，就诞生在这一个小小的刊物之中，我们的对象是一地方人民生活的具体表现。我们既捉住了人、地、文三角的结构，以前所用的区位学方法自然

是不够的。于是我们接受了“功能”的观点来对付整个社区的结构和活动。这些结论详见吴文藻先生的几篇关于“社区研究”的文章中。社区研究不是空谈，须我们来实做的。这一年中耀华在福州的义序开始了一个实地研究。他是研究这个“氏族村落”的家族结构。研究的结果尚未发表。

到第三年我们觉得若不多多做实地研究，我们所说的也要成了一种高调了。社会学中高调已经太多了，我们何必加一份呢？于是我们决定除了训练将来可以实做的人外，凡是有机遇的，大家下乡去。这时出发工作的有泰初到山东和同惠及我自己的到广西两路。广西的工作在最大的不幸中结束，同惠也就为这工作牺牲了。但是她的生命却换来了一个社区研究最先的实例和许多朋友们奋发的精神。泰初的汶上教育证实了我们的观点和方法不但只能用以研究狭义的“社会学”的领域，而可以及于一切社会现象。《花蓝瑶社会组织》及《汶上县的私塾组织》结束了我们的第三年。

在第四年开始的时候，我自己在开弦弓村完成了初步的研究，有义出发山西，耀华出发福建，泰初出发河北。“到实地去”已不复是一句口号，是我们行为的纲领了。

在这时候我们不妨回头看一看。虽则他们现有的成绩是浅薄得可怜，但是我们也不必否认这三年中，每年都有相当的进步。一方面可以安慰我们已死的同工，并给在实地工作的朋友努力的勇气，一方面却愿意我们的朋友大家深深的记着我们离着目标尚远，我们有为研究中国社会树立基石的责任，现在我们还是空言多于成就，我们还没有以事实来证实我们签出的支票是可以兑现，而且，更使我常常发忧的就是如何能维持及发扬我们过去三年朋友中奋发团结的精神，不问收获，但问耕耘的态度。

最后我愿意再提出一些今后我们应做的工作和方向，以作

大家讨论的基础。无疑的我们要坚持我们“到实地去”的纲领。但是这还不够，因为以过去的成绩来说，各人在实地的研究并没有打通一片。大家好像可以独自工作不相关切一般。这一点我认为是个应该改革的弊病。换一句说，我们只注意一地社会制度间的关联是不够的，我们在“功能”之外尤须加一个“比较”的观点。譬如说，在瑶山中我们见到严密的人口限制和他们的婚姻制度的关系，就可以用这结论来做考察新社区时的假设。在开弦弓人口限制没有瑶山那般严格，为什么？反映于婚姻制度上是什么样？这样比较着看我们逐渐可以得到一些普遍的概念，而确定人口限制和婚姻制度的关系。而且在引用比较方法时，我们可以逐渐介绍国外社区研究的结果。好像澳洲 Trobriand 岛土人中父子之爱和母系制度的冲突正可用来和我们父系制度中父母对儿女的感情和婚姻礼俗的关系之相对照。这样，我们可以逐渐建筑我们实验社会学的基础。这种社会学我相信不但在学术上有它的贡献，对于实际社会工作也一定有极大的帮助。

1936 年 11 月 1 日于溪田公园

关于《动变中的中国农村教育》的通讯

泰初：

昨晚从比京返此，得到你寄来的《动变中的中国农村教育》。几天旅途的疲乏都给它赶跑了。我靠炉火，忘情地翻读，我真“忘记了……”你是“在天边的那头”，孤独地躺着，我感觉着一种安慰，你报给了我春天的消息。昨晚你若做梦，准会听见我跳跃的脉搏，我羡慕你们，什么时候，我再能在原野中尝那木床淡饭的滋味？

昨天上午我在北京的市政厅前的广场上，我的朋友指着易拉门式的巨厦，说以下的一段故事：“这楼成的一天，在万民欢庆当儿，突然传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造这楼的工程师，从屋顶上跳地自杀了。他自杀的原因是因为正门的中点没有对准高耸的塔头。这一点过失，使他忘记了他所贡献于人类的伟业，自觉是一个罪人地不愿再见此世了。”我默默地听着，回答我朋友说：“所以自己决不是裁判者！”

你在送我的书上，写着“请你尽量批评，尽量骂。”我却有些踌躇，我虽不是你自己，但是我对于这本书却已黏着了感情，有如我自己的一般，叫我说什么呢？由此我却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做一件事真是没有裁判的么？有的，而且不待死后，不待末日，就在这世界上，在人类的战争中，在存亡生死的决定里，每个人的成就失败会得到它清楚，明白，切实，身受的判决。泰初，我们可以藐视一切言语上的称扬和辱骂，但是不能忘记事实的征验和效果。

我们现在所提出的社会科学的发展方向，其实是极简单的，就是我们要一个综合的、实地的、对于本国的文化现象的认识。综合的是和分科专门的、各不顾各的、偏面的相反；实地的，是和凭空的捏造的、抄袭的、不足考实的、雇用“劳工”间接搜集的相反；对于本国的是和对于外国的相反。最后一项是暂时的矫正，因为现有所谓“社会科学”是洋牌话匣子，在文章上可以引证一百个外国例子，而一句都没有提及问题所在的本国。我们要外国材料，不过是做比较之用，着重还是“自己”。

这个观点，这个方向，有没有价值，不必求诸“言论”，而在看我们从这个观点中所产生的研究收获是不是民族生存上必需的知识？有它无它是不是无关宏旨？是不是把握不住时代的动荡？是不是不值青年人用生命和世俗的幸福来换取的？这

些问题，我希望将来会有最后的裁判者。我的批评或我的骂是无足轻重的。

你现在还是在原野中，我希望你能注意到几个在这本书中没有充分注意的问题。你在这书中虽则屡次说起私塾和洋学竞争中的胜负，是出于所造成的学生在思想上行为上的差别，而洋学造下的形式是不能适合于农村一般的社区组织。这是全书中要点之一，但是我觉得那个命题还不够充分的证实，所谓 *unsufficient documentation*，要证实这命题你还得注意到学生，尤其是毕业生，在社区活动中的地位，因为这命题的重要，所以你不能单单轻描淡写地好像说：“历来出外读书的子弟，毕业后都不愿回家，认为乡间是一条死路。”这一句话最好就举出个例来，尤其重要的就是去找洋学毕业生谈话，他不能调适于原有文化者在什么地方？何以不能适应？譬如有时他的看不起长老，并不是出于洋学教员的“教育”，而是出于他“入学”本身获得新的身分。这新的身分是哪里来的？有了这身分，他可以有名目来不遵守旧有的习俗，因之而引起社会的反感，由此而反对到洋学本身。这不过是一个可能假说，在实地中就可用事实来校核它，而假说的本身应当就是过去观察的结论，譬如，我在我调查的地方见到两个由外头中学毕业的學生。他们穿的衣服是半洋装，有一个戴了眼镜，这就是他们可以因有“学生”的资格而不遵守通行的装束，而他们所具的殊异性，如半洋装，眼镜等本身就是他们新身分的标记，普通人对他们的态度亦是需要注意，因为身分本身就是相互间的态度，即以他们的母亲说，“这两位洋学生的父亲都没有了”对他们都是极顺从的。譬如，我到一位学生家里去时，他母亲就对我抱怨说他孩子太用功，天黑了还是念书，病了也不休息。她劝不理，要我劝劝他。这是一件小事，可是从此可以找到母亲的命令对于孩子行为效率的减弱。这种减弱很可能使这辈洋

学生不受社会裁制而发生和习惯相反的行为！我不嫌烦腻的指出这一点，一方面想说明什么叫“证实”（当然我所用的材料证实力还很薄弱），一方面想说明单在学校中去研究教育（即说是狭义的学校式的教育）亦是不足的。

我读完了你全书之后，我想像到你在实地工作时，一定因为种种事实上的困难，大半是费在学校本身的视察，而缺少住在一个村落中做较长期整个生活的观察，这点好像我是曾和你说过的。问题本身是综合的，我们去了解它也非综合的入手不可。对于第四页末尾讨论研究范围的一节，我亦因之不能和你同意。第一，你用社区来和县府对称是不妥的。县府对称的是村落，县府村落都是社区，社区是一个普通名词，是指：有人民在文化中生活的地域。第二，你说私塾可以用社区作单位，而洋学非得拿县作单位这句话语病很多，你的意思，其实也许是私塾活动的范围是村落，洋学活动的范围因行政系统的结构是县府。这也不很确切，因为私塾既受县府的统制（至少是名义上），和洋学相比较，它们和县府关系亦只是程度上的差别。第三，你曾有两次提起人类学的研究和私塾的研究或教育的研究相对称。在我个人看来也是不妥的，人类研究的领域虽则各人所见不同，也许不必求同，但是我们不妨把“人类学”三字暂时放一放，而采用一新名词来指我们所说的“综合的、实地的、本国的文化研究”作“社区研究”。这名词的好处和意义已有吴文藻先生几篇文字的解释，我想大家一定是明白了。教育，是社区研究中的一部分，亦是了解一社区活动所不能少的一部分。私塾，洋学是教育制度化的一部分。我的分类法不知你同意不同意。

还到综合研究的一点来说，我们认为社区研究的长处就是阐明人类生活各节的关联。你对于这方面，我知道已尽你可尽的力。但是真的要拾得要处，关联的发现，综合的研究，都是

须在一较小区域中做较久及亲密的体悉。多走路，多看码头是不成的。我知道你事实上的困难，可是亦希望你能见到这点，将来可以有机会再干。当然，接下来，我又得说若是你去限制自己只研究教育生活，或甚至制度化的教育生活，在一小区域中的工作会使你单调而厌烦的。惟一的补救就在推广你的兴趣，使你肯放松文化任何一角中所表现给你看的戏法。在观察时决不宜有任何自限的范围，不是答问题式的找材料，而是“开怀畅饮，非醉不止”。在整理材料，编印专刊时，不妨一方面一方面地分开叙述。而这是整个一方面，而不是整个的一部分。

在洋学一部里，你也因之遗漏了一部分重要的事实，就是人家会问你：照你说洋学这样不受人欢迎，这 4699 个学生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有这么多“注重实利”的父兄会干这收不到利的营生么？这问题你虽有一二地方附带的回答过，可是也因为你没有机会去观察这些儿童的家庭生活，所以所有论据亦没有“充分征实力”。学生在学校之外，在入学之前，在出学之后对于学校制度本身的形式和功能，都是有直接关系，但是这些材料不是在学校里所可能得到的。

写就写了不少，我想你不在等我的恭维，所以也不必多说了。我指出的几点对于本书的价值是没有多大的关系的，比了比京市政厅的垂线不合更小得多，希望你不要跳楼，更不要投湖，虽则我已知道你“不怕冰冷”了。燕京的湖面，冰尚未解吧？可惜我们相离太远，不然，在你书印出之日，我准同你痛饮一宵，德国啤酒不坏，可惜你们不在。

1937 年 1 月 11 日于伦大图书馆

关于实地研究

安伦：

得到你决定去金门做实地研究的信，我很兴奋。本来就该复你，却为了赶回来开学，旅途匆忙总没有写成，直到现在。

“到实地去”是我们认为最正确的求学之道。这一点也许和我国传统的见解不十分相合。以前的学者认为学问是在书本上，这种见解有两点是不很正确的。第一点，他们假定我们所需的知识是已经为前人所获得；第二点，他们假定前人所获得的知识是已经写在书本上了。我们若不能接受这两个假定，自然应该另开新路。实地研究包含着几个重要的意思：知识是人对于事物的认识，事物本身是常在变迁的，所以任何人类已有的知识却需要不住地修改和增添。获得知识必须和知识所由来的事物相接触。直接的知识是一切理论的基础。在自然科学中，这是已经不成问题，而在社会科学中还有很多人梦想着真理会从天外飞来。尤其是现在中国的社会科学，因为国外文字书籍的输入，以为靠了些国外学者在实地所得的知识，可以用来推想中国的情形。他们其实假定着文化到处相同的原则，而这原则本身在我们看来就是需要加以事实证明的。而且这假定根本就抹煞了加以详细研究的需要。若是我们一定要一个假定的话，不如先认为文化并不是到处都相同的。因为是不相同，所以我们要推究它不相同的地方，而同时亦不敢随意接受不是从本土事实中归纳出来的结论。这样，我们可以不必和人家争论中国文化现在是否尚是封建阶段或是半封建阶段。我们的回答是：且慢用外国名词来形容中国事实，我们先得在实地详细看一下。

实地研究和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问题式”的方法是不同

的。我们的责任并不能解决问题而是在叙述事实。在我们的立场上看来，是没有什么所谓“人口问题”、“家庭问题”。我们所有的问题是“在一地方人口的数量有多少，组织如何，和他们家庭组织有什么关系等等。”每一个题目都可以引我们到事实的发现。至于“人口是太多么？如何可以改少它？”等等，我们是没法回答的，因为这不是客观事实，而是主观批评。我们不反对主观批评，但是这不是科学而是政见！在实地研究的时候，我们最好没有“政见”。不是去寻材料来证明“哪个办法是对的”，“哪个政见是不错的”。这样做去，你会在无意之中看不见许多事实。我们工作时须对事实本身发生兴趣。譬如我们发现在一乡村中有限制人口的现象时，不必去问“杀婴是好不好的？合不合人道的？如何可以减少这种现象？”我们可以注意的是：“他们每家的人口多少，每家的地多少，每人能种多少地，每人要吃多少米，一家的收支如何？他们对待杀婴的态度如何？杀婴的方法如何？他们知道不知道避孕的方法？他们的关系如何？他们的婴孩死亡率如何？……”

我在上次给泰初的信已说起，我们实地研究的工作最好不要限制自己做哪一部分的观察，好像他专门研究教育，耀华专门研究亲属，华节专门研究礼俗，这是我赞成的。上次信上我已提到若是自己限制了自己，我们只有到人家所谓“教育”、“亲属”、“礼俗”的范围而不知道这些制度的活动是和其他制度互为因果，互生影响的。例如我在开弦弓所见的童养媳，它是亲属制度中的一部分，但是要理解这种事实，我们不能不求诸他们人地的比率，经济上男女的分工（经济），婚礼的费用（礼俗），工作的学习（教育）等等，在我们工作时只有以整个对付整个，在整理材料及编写专刊时不妨一方面一方面的分开来，我希望你不必急功，但求完备！我相信你的性格在这方面比我强得多。

你到实地之后，一定会觉得茫无头绪，所以我供给你一些入手的办法，你找到了该地领袖人物之后，先得把你研究的目的说明，使他对于你没有怀疑。若是这地方你已有相当关系的，这当然容易办。第二步你可以说要调查各家的人数。若是他们已有保甲制度的那更方便。你可以拿了他们的名册，如可能的话，请领袖一同去复查一遍。在调查人口时，我们目的并不单是“调查”而已，这是一个“穿门入户”，和每家人家接触谈话的题目。在谈话中你可以问各式各样的问题。若是他们有个儿子在外乡的，你就可问到他为什么出去？多久了？他结了婚没有？太太带出去么？由显著问题慢慢的会问出你预料不到的事。于是你得到了线索，可以一直不放松的拉下去（不一定是当天问完，也不一定在一家问全，只是你把问题记在心上，一步一步的追究）。

等你全村人口查完，全村人也都认识了你，你也认识了他们。你研究的线索也有了。这时，不用我说，你会只觉时间不够，废寝忘食地醉在里面。但也有时，你躁急得利害，可是没有机会去观察去谈话。那时你不妨借这闲暇来整理一下自己的材料，甚至你好像要编写全书的工作。在整理中，在编写里，你会发现什么地方还没清楚，哪还有漏洞。若你另外用一本簿子把问题记下来，它准会比本文还多。这样一次一次的往深处走，虽则永远走不到自己会满足的地步，可是你的认识也愈来愈深刻了。

我随后将寄你一份“文化大纲”的表格，是我在课堂的记录。这表的用处是在叫你时时兼顾全局。哪处还没有注意，哪处还是缺漏。我希望你发生任何问题，有需要我们帮忙的，抽空写出寄来，我更希望以后我的《伦市寄言》都是和你们在实地研究者的通讯和讨论。但不知离了实地的人能不能帮助你们罢了。

1937年1月14日于伦大图书馆